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五一期 ——
(二〇〇八年六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6b)

【本刊专稿】	“钱信莎事件”释疑——洗恒汉回忆录补正之三	余汝信
【人物春秋】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节选一)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钱信莎事件”释疑——洗恒汉回忆录补正之三

• 余汝信 •

洗恒汉说：“钱信莎，女，原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文革期间，她曾是二医大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1〕。洗这一段话，前一句是准确的，后一句不准确，钱不是小头头，而是二医大造反派的第一号人物，大头头。

为什么会有“钱信莎事件”？这就须由“二医大造反派”说起。

一、“红纵”造反前史

所谓“二医大造反派”，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简称“红纵”。文革初，二医大干部子弟多，得风气之先，造反甚早。这“红纵”是军队院校中最早成立、也是总后系统院校乃至全军院校最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2〕。

1966年“红八月”，“红纵”组建于沪上。据钱信莎后来交代，8月下旬，张春桥接见了钱信莎等，表态支持“红纵”派人到北京上访。上访队一行十人由钱信莎带队，到京后经全军文革同意并通知总后文办解决食宿问题，又同意他们住进总后机关大院内。经串联，上访队协助成立了总后系统内后勤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和总后机关“红色造反团”两大造反

派组织，加剧了总后机关的动乱。

1966年9月中旬，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全军院校来京参加国庆检阅。9月下旬，二医大的大部队到达后，总后负责人令上访队归队，上访队不从，总后部长邱会作决定：强行归队，如不执行，以军纪论处。9月25日，邱与饶正锡（总后副部长）在总后办公区指挥了二医大对上访队的围攻，将钱信莎等从总后大院中抓了出去，在大部队内部看管起来。

9月27日，由学校领导主持，二医大学员在其临时住处后勤学院召开“民主辩论大会”。大会过程发生混乱（“红纵”的对立面说是“红纵”故意制造的），“红纵”趁乱抢走钱信莎等人。抢人时钱的衣服被撕破，皮肤被抓伤（对立面说是“红纵”故意撕坏的）。被撕坏的衣服，还有一封血书，被送至全军文革办公室，又由当时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送到了钓鱼台。

10月1日，“红纵”核心成员、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就“红纵”被总后邱会作等负责人“镇压”一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告御状”。这一状告准了。据刘志坚回忆：“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3〕。

陶斯亮的告状，无疑加速了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进程。10月5日，毛泽东同意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下发。《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这些话，体现的都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思维。

《紧急指示》下发当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来京串联的军队院校十万人大会。叶剑英在大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刘志坚的回忆，将其与次日在同一地点张春桥的宣读混淆了，不过，刘志坚如下回忆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1966年11月，北京相继发生了多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有些来京学员到各军种、兵种机关和总部，不分日夜地轮番地要求领导接见，要求解答问题。如不接见，有的‘造反派’就静坐、写血书、绝食。还有的‘造反派’把一些领导同志，如许光达、崔田民等揪到旂坛寺国防部大门外来，把装有文件的铁柜也抬来，诡称文件柜里藏有镇压学生的‘黑材料’，非要‘全军文革’接见不可”〔4〕。

二医大“红纵”，就是冲击、揪斗的佼佼者，遂成为军队院校著名的“八大造反派”之一。

《紧急指示》下发的前一天，“红纵”就已听到风声。10月5日上午10时，“红纵”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学校的文革运动由“红纵”领导；学校的一切权力由“红纵”行使；学校的原有领导干部由“红纵”集中办学习班。

10月8日，江青在军事博物馆接见了“红纵”勤务组全体成员。据悉，这是江青首次接见军队院校造反派代表。

11月5日，“红纵”以总后党委拒绝交出院校文革中的有关材料为由，封闭了总后司令部保密室，并称其“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二、“打倒邱会作”

“红纵”批判的对象，除本校当权派以外，主要是总后的领导，尤其是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5）

从《紧急指示》下发后的10月9日到11月17日，邱会作天天处于“红纵”车轮战式的连续批判之中，不能正常工作。批判的时间，是每天晚上七时左右直到次日早晨六时。大约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又派人来向邱“提问题”。这样的批判，大约连续了一个月，主要是批判邱“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对院校搞摸底排队”，“没有将海医研究所的领导关系立即转到二医大，是分裂造反派力量的阴谋”、“要求承认‘红纵’是革命左派”等。11月17日，邱会作在后勤学院礼堂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大会批判中晕倒在会场上，总后文革办公室人员将邱送到301医院抢救，“红纵”还派人跟到医院，叶剑英遂将邱送到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休养。

1966年12月底，“红纵”大部回到上海。翌年1月中，中央文革认为军队的文革搞得冷冷清清，遂由张春桥建议，江青批准“红纵”大队人马再次来京。1月19日下午，邱会作接到新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的电话，徐以军委副主席名义命令邱立即下山，回总后参加运动。在回总后途中，叶剑英派秘书赶来劝阻，邱称：已经牵涉两位元帅了，为了叶帅，我也要回去！

邱一到总后机关大院，即被造反派包围，“红纵”将其拉到总后卫生部办公室关了起来。从第二天晚上起，每晚都要对邱“审讯”，每次时间都在四个小时以上。

1月23日、24日一连两天，“红纵”等造反派在总后大院大操场批斗邱会作。

24日上午的批斗会，由钱信莎主持，邱一被押上台，钱即将邱的领章帽徽扒掉了。一个大个子走上前去，一拳打在邱的胸前，邱侧身倒下，大个子又将身上已经流血不止的邱拉起来，给邱挂上一块二十多公斤重的铁牌子，要邱双腿跪下，施行“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打倒镇压群众的凶手”、“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万岁”、“向造反派致谢”（又称“喷气式”）等七八种严酷的体罚行为。

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的邱会作，当天下午趁看管的人不在，在地上捡了个纸烟盒，用嘴咬着一个铅笔头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了一封求救信，交总后保卫队人员、邱原来的警卫员蒋平安送出给邱的小孩，转送到通信兵后勤部胡敏（邱的老伴）处。据说，邱的信于当晚12时才送到林办，惟此前晚上9时多，林办已得到消息。叶群当即持林彪、陈伯达的亲笔信到总后，从造反派手中解救了邱，将邱送到翠微路五号院。在五号院，叶群向邱会作宣布：“我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组长、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救你的。这里是杨代总长暂时住的地方。现在你就在这里休息，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叶副主席早已有安排。”

1月25日晚上，叶剑英派西山工作人员在警卫车护送之下，将邱接回西山邱原来养病的房子。叶剑英、聂荣臻和西山工作人员在宿舍门口等候，当工作人员将邱由车上抬下后，叶等各人流下热泪。翌日下午，刘伯承到邱处看望。

邱会作被叶群解救之后，“红纵”仍不甘罢休。1月29日，由“红纵”领头，总后各造反派组织派人到三座门三号全军文革办公室静坐，以对全军文革实质是对军委施加压力，坚持要揪出邱会作。

2月1日，徐向前接见在三座门静坐的“红纵”等九名代表。徐向前在讲话中按中央、军委的统一口径，力保了邱会作。徐向前称：“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下面只好执行，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如刘志坚搞三点黑指示，下面的这些人都执行了，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面反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面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6〕

2月4日，“红纵”出版的《红色造反报》隐瞒了叶群1月24日晚到总后大院的主要目的，发消息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派勤务站，会见了我们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叶群同志说，我们认为你们红纵是很革命的组织，我们支持你们，向你们学习”〔7〕。

同一期的小报还刊载了《邱会作的滔天罪行》一文，称邱“是披着羊皮的狼，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推行刘少奇的黑货。在组织上，搞宗派，任人惟亲。在生活上腐化堕落，荒淫无耻。在文化大革命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8〕。

然而，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力保的对象，“红纵”打邱的种种言行，也就必然全是无用功。

三、“红纵”后史

2月8日，陈伯达到三座门接见了“红纵”及总后机关、院校其他造反派代表。陈伯达说：“你们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了，我们没来看你们，很抱歉。我希望大家回本单位去，在大街上不好，回本单位去，回学校去，有问题可以到那里商量。在这里吃不好睡不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安心。”陈伯达还表示：“我是保护你们，也保护邱会作，不是没有原则的保，我保他的同时，也就是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呆下去不好。”〔9〕

对于造反派来说，陈伯达讲话比徐向前管用。陈伯达现身讲话之后，在三座门静坐已有十天的造反派也就散了。

3月30日，总后大院的混乱局面有所控制，邱会作的身体也有所恢复。这一天，周恩来率陈伯达、江青一千人，领邱会作回总后工作。周恩来在当天召集的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力挺邱：“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

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是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10）

周恩来还说：“同时，也希望邱会作同志现在又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长期的工作，远的不说了，就是我们解放以后和平十七年，后勤工作可以说，有三个时期，初期是刚开国，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虽然作政府工作几乎也是大部分时间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别在后勤支援方面管得多。那个时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杨立三同志，恐怕是你们第一任的后勤部长，那就是解放后，这位老战友那是病故了，他对后勤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在抗美援朝上说是尽了很大力。今天在座的还有跟他同事的嘛。这是我相当熟的那个三年多。后来，彭德怀回来了，他管国防部、军委，那时任何人都不能过问的。主席的话他都不听嘛，所以我们就没接触了。先是黄克诚，后是洪学智，那时就是开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钱，要东西就是了。那是一个长时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会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军委，那么我们的关系又密切了，协作了，要需要部队支援的，可以说，只要党啊，政府啊一要求，总是支援的，你们做后勤工作，都会感觉到嘛，都会想的到嘛，支援了许多，所以这点，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所以，在工作上也有个比较嘛。因为鉴定一个同志的全面工作，也还得跟别的比较，跟好的比较，跟坏的比较。对立面有个黄克诚，洪学智。那么一样好的，但是他超过杨立三同志，因为他时间长，杨立三同志时间短，成绩也超过他，因为现在管的方面大，而现在管的不仅仅是我们解放军嘛，我们解放军现在扩大的，已经包括许多工程部队都进来了。”（11）

打邱不成，3—4月间，“红纵”打道回府，返回上海。小部分如钱信莎等仍留在京活动。

应该指出的是，“红纵”批判的对象虽主要是总后领导尤其是邱会作，但又不限于此。“红纵”从1966年12月起就参与“斗争罗瑞卿”的活动。1967年中，“红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简称“斗罗筹”）的主要成员。5月12日，由其参与联合发起，召开了批斗罗瑞卿大会，陪斗的有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原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苏振华（海军政委）、刘震（空军副司令员）、宋烈（原公安部队副政委）（12）。

1967年“五一三”事件，是军队文革的一个转折点。“五一三”之后，曾经支持军内造反派的全军文革基本停止活动。8月，代替全军文革主管驻京单位、院校文革运动的军委看守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成立，类似“红纵”这样的军内造反派组织失去了靠山，迅速走向了消亡。

四、“钱案”与叶剑英及其他

冼恒汉说，钱信莎1968年毕业分配到兰州军区驻青海西宁的第四医院工作，未几，总后来人审查钱，并要兰州军区协助看管。后兰州军区在军委办事组施压之下，接下“钱案”，“九

一三”事件后解除审查。

冼恒汉又说，文革后分别任兰州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萧华、韩先楚将“钱案”作为“冼家帮”要“阴谋陷害军委领导同志”即叶剑英的主要罪证，写在冼的审查结论里，“那么，一个二医大学生的事件和以上罪名又有什么联系呢？免职以后我才搞清楚此事的背景，原来钱信莎据说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亲戚！”（13）

冼恒汉没有说清楚的是，钱信莎与叶剑英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审查钱信莎暂且不管对错，原意是否牵涉到叶剑英？

钱信莎的父亲钱益民，是参加过长征的江西老红军。从红军时代起，一直在政治保卫部门工作。抗战爆发后，曾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保卫部科长，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锄奸部副部长，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说起来，也是四野的老人。建国后，历任四野暨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共湖北省委交通工作部副部长，文革初期，任湖北省计委副主任。钱益民的女儿、钱信莎的妹妹钱玲戈，文革中期嫁给了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说白了，钱信莎就是叶剑英二儿媳的姐姐。

文革结束后，在湖北地方宦海沉浮多年的钱益民重返军队，由地方一位厅级干部擢升为副大军区级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时国防工办列入军队编制，任副主任的还有叶剑英的女婿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等）。钱益民的升迁是否与其亲家的提携有关？旁人不便妄自猜测，况且这些都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客观地说，钱信莎受审查，与叶剑英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其一，钱信莎受审查时，钱玲戈与叶选宁恐尚未成婚，且审查者十之八九并不知道钱信莎与叶剑英有如此七拐八拐的“亲戚”关系；其二，前文所述，在1967年叶剑英是站在邱会作一边的，对邱采取了保护措施。叶并没有站在“红纵”的头头，他未来的“亲戚”一边，支持“红纵”甚为过激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叶剑英对邱会作是有救命之恩的，邱如知道钱与叶家的关系，想必也会对钱网开一面吧？

“造反有理”缘自于毛泽东1940年代的一段“语录”，文革初又为毛再三倡导。多少热血青年，在伟大领袖的召感之下为之冲锋陷阵，名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966—67年，多少青春生命将文化大革命视为盛大的节日。钱信莎等年轻女军人的造反行动，应也可作如是观——主要责任，应归之“伟大领袖”。

而对邱会作等老干部来说，文革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们决不会反对毛泽东，但确难以理解那一场“大革命”。更重要的是，总后机关这样的军事重地，如何能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乱冲乱闯，搅得天昏地暗？总后一旦乱了套，如何向中央、军委交待？况且对邱来说，最窝火的是钱信莎等人背后的全军文革、中央文革，以后邱等人对张春桥之流的极其反感，恐怕也因此而来。

造反潮退之后，对钱信莎、陶斯亮等“红纵”头面人物（陶斯亮在陶铸倒台后淡出了“红纵”），总后开始也没有太为难她们。她们仍然穿军装、有军籍，按正常分配渠道到对口单位工作。钱分配到兰州军区西宁第四医院，陶斯亮分配到甘肃临夏第七医院。据说，钱信莎比较自负，对文革中所作所为一直不检讨，至1969年，总后才对其组织了专门的审查组，在全国清查“5·16”时，对她进行了隔离审查。

钱信莎当然不是什么“5·16”。对钱信莎的审查，不排除有总后另一派即保守派及老干部在重新掌权后借机找钱出气的因素在内。当年被斗得趴在地上几乎丧命，今天有机会可出气，即使如邱会作这样的高级干部，想必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是否就如冼恒汉所说：“‘钱信莎事件’是‘文革’浩劫中无数个冤、假、错案之一”，“‘钱信莎案’，实际上是邱会作搞的打击报复”？窃以为也未必。由于有明确的政策规管，“出气”还是有限度的。冼恒汉说军委办事组执意要兰州军区将钱信莎按“现行反革命分子”定性，恐言之不实。军委办事组真要抓住钱不放，第一可不予分配，留校看管；第二即使已分配，也可收回由办事组直接审查，无须假手他人。冼说兰州军区后来在办事组压力下以军区党委名义将钱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而办事组未批，这究竟是兰州军区在压力下所为还是军区自己所定？冼是否为自己开脱而将责任推给军委办事组（否则军委办事组为何不立即批复）？值得探究。

无论如何，钱信莎当年确实在总后闹了个天翻地覆，捅了个很大的马蜂窝，这在总后机关人所共知，一点也不假。保留了她的军籍，给她分配了对口的工作，内部审查审查，要她认个错，这对比起以后地方上查“三种人”，把造反派头头关进监狱判刑的做法，总后对造反派的处理相对来说，却也算是比较宽容的了。本文无意对钱信莎们当年的所作所为作任何价值判断。惟今天即使“黄吴李邱”的案子还未翻（长远来说，应该有翻过来的一天），也总不能说钱信莎们当年横扫总后的造反行动就是正确的。（2008年5月）

注释：

〔1〕〔13〕冼恒汉：《风雨八十载》（冼玲的博客，<http://9link116.com.cn/nade/29952>）。

〔2〕本节内容，参考了二医大“红纵”出版的《红色造反报》、《红色风暴》，后勤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出版的《燎原》及当事人的回忆。

〔3〕〔4〕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页253—254。许光达，时任军委装甲兵司令员；崔田民，时任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

〔5〕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当事人的回忆。

〔6〕《中央首长讲话》（2）（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翻印，1967.3），页15。

〔7〕〔8〕《红色造反报》第6期（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报》编辑部，1967.2.4）。

〔9〕同〔6〕书，页66—67。

〔10〕〔11〕《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翻印1967.4），页303—304。

〔12〕《斗罗战报》第1期（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编，1967.5.20）。

~~~~~

## 【人物春秋】

###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节选一）

• 舒 云 •

◇ 先是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被抓

1967年1月22日清晨，杨勇被抓。

关于这个时间，有三种说法。一种普遍的说法是1月21日，主要来自当事人回忆，没见

到文字记载。北京军区大事记是说1月22日，这个时间和很多人回忆抓杨勇是个星期天吻合。抓廖汉生是个星期天，抓杨勇也是个星期天。也许抓杨勇的人是1月21日夜里去的，抓到杨勇是1月22日凌晨。第三种说法是老二杨冀平说他记得很清楚，他是和父亲同一天被抓的，那就是1月19日。因为1月19日是他的生日，所以给他印象很深。关于父亲哪一天被抓是他事后才听说的，也可能有误。好在早一天晚一天没有更多的意义，但杨勇被抓这是不争的事实。

1月19日，在矿院附中读高二的儿子杨冀平被抓了起来。这是他第二次被抓。杨冀平一共被关进监狱三次，第一次是1966年底，他和同学去地质学院看大字报。那天正好地质学院斗彭德怀，怀疑他们要抢人，就把他们送到半步桥第一监狱。一问三不知，关了几几天放了。第二次被抓与杨勇被抓似乎没有更直接的联系，是个偶然。

但偶然中有着必然。

那天晚上，北风像狼一样不停地嚎叫，叫得林彬坐卧不安。

就在十几天前，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就是开着会时被造反派抓走的，事先几乎没有更多的征兆。实际上是有征兆的，早已剑拔弩张，只不过当事人不知道罢了。

对于北京军区来说，文革开始的第一件大事，是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般的参谋干事恐怕不知道，领导层的秘书们、部长们都有所闻。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北京军区负责现场组织，杨勇和廖汉生都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对他们说，林副主席说北京军区封锁他。

毛主席说得相当严肃，并不是开玩笑。

杨勇和廖汉生都猛一下愣了。

这话从何说起？

以后杨勇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来京西宾馆开边防会议，在抗美援朝中担任王平秘书的李子平也正好在京西宾馆开会，就去看他。杨勇说我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员，军事上向总参请示，政治上向总政请示，不能直接到林彪那里去报告。不是说林彪垮台了，我就说他不好。我哪有胆量反对他，我只是按组织原则办事。

封锁林副主席，又是由毛主席说的。也就是说，北京军区在封锁毛主席。再进一步推理，你封锁领袖，你是想搞……政变吧？

这还了得！

回来在常委中传达，大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马上查。

翻箱倒柜查了好久，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机关业务部门对总部的业务部门，大事小事都有请示报告，封锁从何而来？

谁敢去问？你没有办法去追问在什么事上封锁。党办秘书说，是不是因为电报的问题？各大军区给军委的请示报告都是电报，而北京军区挨着近，就没走电报，而走文件。机要部门有



这样的习惯，电报的规格比文件高，电报不管大事小事，一律送中办。而文件就要挑挑捡捡，有很大一部分就送不上去。

再也找不出其它原因了，只有电报这一说有几分道理。以后北京军区规定，凡是给中央的报告，不管大事小事都走电报。

尽管亡羊补牢，但在毛泽东那里，已经明显对杨勇、廖汉生政治上不信任了。

波及北京军区的第二件事是炮轰贺龙。廖汉生和贺龙有亲戚关系，廖夫人又是杨尚昆的妹妹，贺龙被抓了，杨尚昆也被抓起来了，他能跑得掉吗？

北京军区大事记有这样几段。

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第七天，北京军区常委会第91次会议决定，各军级单位以上的机关从9月开始文化大革命。这时，军区已成立文革小组，并对师以下部队保持绝对稳定提出了措施。

8月31日下午，北京军区接到军委和总政关于暂缓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立即向各军级单位传达，转入正常工作。

9月1日，军区常委第93次会议确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凡没有开始的，暂不开始。已经开始的，立即停下来，争取9月5日转入正常工作。以后什么时间再搞，听候军委通知。京外单位由杨勇、廖汉生、郑维山分别打电话讲清。步校、军区宣传部、文化部、报社、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

通知终于来了。

1967年1月7日，军区常委第120次会议召开，决定军区司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于9日开始。更耐人寻味的是，决定由陈先瑞、宋玉琳等组成一个班子抓工作。

这就是说，已经把杨勇、廖汉生排除在外了。

粗粗一算，从1966年8月25日到1967年1月7日，总共135天，刨去半个月的节假日，在120天里，开了29次常委会，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召开一次。

接下来，8日9日没有记载，10日记了一个手榴弹试制的情况。11日到24日，又是空白。29日，周恩来、徐向前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群众组织，包括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冈山、火炬、星火、革命青年及革命敢死队等，并作指示。随同接见的有郑维山。

再接下来是军区党委报告，军区已开展文革单位39个，1月8日揪廖汉生，1月22日揪杨勇，群众开大会批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走红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晚上都要碰头，解放军报社有人参加。挂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头衔的江青在会上对军报的人说，北京军区是一潭死水，廖汉生是贺龙的死党。她要军报去北京军区把廖汉生揪出来。解放军报社觉得揪北京军区政委，这么大的事，好像儿戏一样，心里没底，就按兵不动。

过了几天，江青沉下脸又问，怎么还不去？

这下不能稳坐钓鱼台了，军报总编唐平铸等人连夜回到报社，写大字报，因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字写得苹果般大，凑了几大张。主要是说廖是贺龙的人，那时贺龙已经被揪出来，说是他要搞“二月兵变”。大字报写好，大半夜的找不到人签字，就把夜班编辑全喊来。当时一个夜班编辑邵一海说，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编让在大字报上签个名，就签吧。这样，大字报上签了一堆名字。事先总政通知了北京军区，说有人要到军区贴大字报，要军区协助张贴。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怎么能随便进入警卫森严的办公主楼呢？一群人连夜驱车到了北京军区，把大字报挂到办公主楼门厅的横梁上，垂下来，洋洋洒洒，很有气势。

天一亮，北京军区轰动了。

副政委陈先瑞在大厅看到大字报，问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发生了什么事？傅崇碧摸摸突然长出来的胡子，伸了个“八”字，什么也没说。陈先瑞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也没再问。当时军区宣传部干事李奎祥回忆，早上他正在政治部食堂吃饭，某副政委的秘书对他说，主楼贴大字报了。他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和某秘书一起去看。

大字报是星期六晚上贴的，天一亮，是星期天。按说星期天办公楼除了值班的，没有什么人，冷冷清清。可那一天早上，人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大院都知道了。那个时候，只要穿着军装，战士也可以自由出入平时戒备森严的办公楼主楼看大字报。北京军区大院跟全国一样，都已经是一堆干柴，谁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呢？一点火星马上燃烧起来。转眼，大字报把办公楼糊了个满，大院的墙上，马路上也全是大字报。你革命我更革命，有人大喊，把廖汉生拉来斗，一句话，马上得到响应。

廖汉生在哪儿呢？

在那种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星期天不星期天的概念了。

此时，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正在卫戍区参加军区常委会。

文革一开始，北京军区搞了两次“四大”，很快有军委八条，就停止了。因为远离市区，军事院校的学员想冲击比较困难，但还是有冲进来的，甚至常委会也敢冲。闹得常委会想开会却没安全地方，于是，不得不挪到庆王府的卫戍区开会。

江青一伙酝酿抓廖汉生时，廖汉生正在张家口参加四好连队总评，通知让他回来。常委会由第一书记杨勇主持，他正传达军区文化大革命中各单位要抓好日常工作。没讲几句，文工团的一群人闯进来，大喊大叫要廖汉生去看大字报。

会议停下来，大家面面相觑。

谁也不说话。

谁也不说话，一直冷场，这个会还怎么开？组织部部长董奋那时还兼党办职务，所以也参加了常委会，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我看这个会开不成了嘛。副政委张南生挨着董奋，其实他听清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人打破僵局，他马上说董奋，你说什么？你再说说。本来董奋的话是在嗓子眼里，别人没听见，让张南生这么一喊，所有的人都瞪着董奋，看他说什么。董奋不好意思，不敢说了，又不能不说，我说这个会恐怕开不成了。为什么开不成？张南生不知道主楼贴

大字报的事情，在座的好多人也还不知道。董奋不得不说，不是夜里贴了大字报了吗？以后说董奋泄露天机，查了他很久。本来部署抓廖有一套，让董奋打乱了。

廖汉生马上明白，说我什么时候来军区，工作多长，大家都知道。

然后他站起来，说好吧，掏出一个小本交给秘书，保险柜钥匙也掏了出来，最后把衣服上的几个兜底都掏出来，让大家看他一无所有。

杨勇主持会议，但他没有力量阻止，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廖汉生自从贺龙被抓，就明白自己实在是岌岌可危。看大字报是假，被捕是真。

押着他看了大字报后，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明白了。

整个事件都发生在大夺权的1967年1月8日。

1966年8月1日，杨勇和廖汉生出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12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正在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这是个打招呼会。传达人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次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经下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那么接下来，下边是不是也要改改组呢？

进入1967年以来，中国大乱，上海的“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军队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数千学生冲进沈阳军区大院，殴打警卫战士，副司令员唐子安也被打成重伤。南京军区八名领导同志的家被抄，两名部长和一名副政委下落不明……

廖汉生被抓以后，代总长杨成武来到总政翠微路招待所，临时召集北京军区领导开会。他当着杨勇和北京军区其他领导的面，说杨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说不清，你今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明天就可能不是。但闹得那么快，采取那样的阵势，是军区大多数干部包括杨勇没有想到的。

#### ◇ 神秘的“星火燎原”

廖汉生被抓两个星期后，又是个星期天，风云突变，同样的厄运轮到杨勇了。和廖汉生的罪名差不多，只不过把打倒贺龙换成了打倒萧华。

以后“九大”会上，毛主席说杨勇很能打仗，很有功嘛，怎么回事？怎么是“三反分子”？他是什么“三反分子”啊？

杨勇被抓明明是江青一伙的指使，听毛主席一说，江青却马上反咬一口，陈伯达也马上推了个干净，说这个事情我们不清楚。

有一天，从城里开到军区的班车在平安里那一站停靠时，上来一个小伙子，塞给车上人一卷传单，什么也没说，就下车了。这个神秘的小伙子是谁？哪个单位的？没人知道。事后也没有查出来。传单上署名“星火燎原”战斗队，煽动北京军区揪出杨勇。

关于“星火燎原”，还真搞不清怎么回事。据军区的老职工回忆，那时有个“星火”战斗队是军乐队的，还有个“燎原”战斗队是文工团的。体工队解散了，处理冰刀冰鞋三毛钱一双，要不体工队也要有个什么战斗队。文工团的“燎原”又分新“燎原”和老“燎原”，老“燎原”是保皇派，新“燎原”是造反派，燎原来燎原去，搞不清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自称“星火燎原”的战斗队，曾在一个月内横扫了三个大军区，他们冲击了北京军区司令部大楼，砸开了档案室，要查抄“华北党”。杨勇命令警卫营把这批人“请”进地下室。康生告了御状，很快毛泽东让秘书要通电话，杨勇嘛，听说你下令抓人了？杨勇听出毛泽东明显不高兴，说报告主席，今天上午有人强行冲击办公楼，威胁到核心机密。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允许他们来，所以……

毛泽东缓缓了口气，好嘛，马上放人吧，就当成一次防突袭演习吧。

徐向前说，杨勇是个好同志，是员战将，对党忠诚，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干部，对下级从来不摆架子，不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样的好同志怎么能成“三反分子”呢？

在北京军区和杨勇打交道最多的作战部里，很多人不理解。时任防空科科长张华夫在运动中是个逍遥派，他回忆说，星期六回家，星期天去了作战室值班，吓了一跳，怎么军区司令就被抓了？很多参谋也是同感，杨勇那时经常到作战室来，话不多，但办什么事很干脆，为什么要抓他？

当时政治部是个“翻江倒海”战斗队，司令部是个“红旗攻坚”战斗队，这两个战斗队伙着去京西宾馆抓的杨勇。这边，某副司令召集四个副参谋长在作战室开会，传达抓杨勇。当时文革很乱，但作战部尤其是作战值班还在坚持，某副司令对作战值班参谋说，半夜开始行动，要值班参谋把作战部的人都叫起来。

抓杨勇那天晚上，作战部是防空科的参谋刘建林值班，一个司令怎么能随便抓呢？刘建林给军委打电话，说他们好多战斗队要揪军区司令员。军委答复，现在还没有发现问题，不能揪斗。以后作战部开会，举行表决，刘建林投了反对票。

作战部的几个人去了京西宾馆，但没找到杨勇。

张华夫奇怪极了，怎么都是军事干部，没有一个政工干部，是不是搞政变？

以后，杨勇到总参工作，他没有去追究北京军区文革初期的事情。他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北京军区是怎么乱的，连我被抓都不知道是怎么抓的。

据徐向前回忆，1967年1月间，叶剑英忽然对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

京西宾馆会议刚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漫天贴出大字报，“杨勇何许人也”，1月23日，战友文工团的某些人跑到徐向前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徐向前接见，不接见不走。徐向前接见了他们，说杨勇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

但此话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乱，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这一点，他与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的意见是一致的。

1967年1月6日，杨成武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徐向前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他来挑。沉默一会儿，徐向前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

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

听到是江青提议，徐向前更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吧。

回家后，徐向前和夫人黄杰反复琢磨，为什么江青忽然提议？不知出于什么用心。平时与她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毛主席的生活，毛主席找徐向前谈工作，江青极少在场。想来想去，既然毛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后来，徐向前见到毛主席，当面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

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徐向前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不到三个月，免职后连说谢天谢地。徐向前说，焦头烂额，每天抽两包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全军文革小组的名单，及改组军委文革的通知，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看后提出三条：

（一）新的全军文革未成立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座谈，交代一下政策。

（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尤其是海、空军要随时准备战斗，指挥失灵了不好。现在有些机关干部，要求成立“战斗组织”，机关如果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北京军区抓了廖汉生，又要抓杨勇，空军也把王辉球、成钧、常乾坤抓走。这个问题应研究解决，否则大家心里没有底。

这一番话很清楚地说明徐向前对为什么抓廖汉生和杨勇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被某些人用来当“傀儡”的。

#### ◇ 大闹京西宾馆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

胡痴、叶群、王峰、张涛、和谷岩等。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和联络站，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没几天，围绕批判和揪斗萧华，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代表，公开点了总政主任萧华的名字，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当即总政就混乱起来，有人刷大字报要打倒萧华。周恩来马上出来辟谣，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江青紧张了，派人连夜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覆盖起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已经平息。

徐向前回忆，1月19日下午，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争论起来，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几个老帅认为不能，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认为军队不能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双方僵持不下，叶群说要发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稿子，念起来，内容是批判萧华，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陈伯达、江青也说了萧华许多坏话，江青说，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

徐向前以后说，接着几个人发言，都有发言稿，显然这次批萧，是事先预谋的，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因为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

但是，会上又讲要在北京开万人批斗大会，给北京军区分配了参加人数。杨勇很为难，他知道萧华红小鬼出身，根本没有问题，战争年代，他们曾搭过伙计，一个团长，一个政委。虽然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却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杨勇常说，萧华有才气，他的《长征组歌》写得真好。杨勇被关起来后，加在杨勇头上的罪名就有一条支持了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的创作演出。可是，要调动部队参加万人批斗大会，又不能不布置，个人根本无从选择。

北京军区常委扩大会还没开完，消息走漏。当晚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连夜坐着卡车去萧华家，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抄了萧华的家。没抓到萧华，把萧华秘书李圭抓起来了，文件也搞走了。

萧华从后门走脱，跑到徐向前家。

可徐向前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萧华又转到傅钟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徐向前得知此事后，当晚责令全军文革立即追查。

第二天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

江青到得很早，她故意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躲到哪里去了？

这时，萧华来了，说了昨晚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掉到地上。叶剑英也拍了桌子，他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

在2月15日、3月3日会议上，周恩来和老师都严厉批评了冲击萧华、冲击总政、冲击军队的恶劣行为，明确提出要保萧华。

这以后成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二月逆流”。

但这与杨勇有什么关系？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林冲卖刀，误入白虎堂。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总之，没有任何道理，杨勇被抓。

以后杨勇恢复自由，要找1月19日的记录本。但是，记录本已经在抓杨勇的那天晚上就被上边收走了，杨得志那一天的笔记也被收走了。

杨勇被抓后，萧华没多久也被正式打倒。

◇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事情就这样，两面全是刀。

这中间，有这么一件事，毛主席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贺龙、杨勇、廖汉生都在，毛主席对杨勇说，你会搞阳谋，不会搞阴谋。回来的路上，杨勇问警卫员小孙，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孙说我也搞不清，您跟罗瑞卿、贺龙都是工作关系。

在此之前，1966年夏天，天很热，海军学院副院长王晓到北京开会，他和老伴去看杨勇，好几年没见，自然聊得很热闹。那一天，正好王平夫妇也在。到杨勇和王平相继被打倒后，王晓的这次串门被说成是为杨勇和海军政委苏振华牵线，说杨勇把手伸到海军。一切都过去以后，王晓又见到了杨勇，说起这件事，说我不该去，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吃了很多苦头。

杨勇说，哎呀过去的事，不提他了，大家都一样。

1月中旬，杨勇从石家庄看地形回来，正在京西宾馆思考华北地区军事演习的细节，他感觉到了可能大难临头，但又坚信自己不会大难临头。

造反派要揪副参谋长马卫华。马卫华正在北京医院住院，造反派问杨勇，杨勇没说。夜里10点多，司令部造反派押着副司令员萧文玖去揪马卫华，出了南营门。小孙对杨勇说，这事不大对头，你在主楼，我去看看动静。这天晚上，江青要来北京军区看大字报，杨勇走不了，怎么办？小孙说，穿上大衣，从后面到空军的雷达站去，躲开她。夜里12点10分，秘书找杨勇找不到，问小孙在哪？说总理在福建厅要找杨勇，3点要赶到。杨勇说，反正我没问题，绝对不能把马卫华推出来。到夜里2点多，杨勇说走吧，小孙说怎么走，自己的车不敢动，从军区车队要个212吉普，去了人民大会堂，然后到了京西宾馆。

阴云越来越浓，搞不清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1月18日，被抓的前三天，杨勇早上起来，下楼吃饭。杨勇在电梯里碰上几位将军，平常关系很好，见面总要开玩笑，这回人家理都没理，就当没看见。

杨勇吃了两口饭，上来，对小孙说，我绝对不反毛主席，我不是“三反分子”。

小孙说，司令员，我相信你。

这一天显得很长，平时不断的电话也没了，显得特别不正常。

杨勇很烦，吃饭也不吃，坐在那苦思苦想。

他早知大事不好，1965年底上海会议罗瑞卿出事后，杨勇就知道自己也跑不掉。总政的文革开展得比较早，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在1966年的五六月间就被揪出来，他的一大堆罪状中主要一条是支持和参与大比武。梁必业与大比武的关系哪里有杨勇与大比武的关系密切，大比武是在北京军区地盘上比的，如果大比武是罪过，那么跑得了谁也跑不了北京军区司令员。

自从突然被通知去参加揪出罗瑞卿的上海会议，杨勇就有思想准备了。那不仅对罗瑞卿来说是一场突然袭击，对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也是一场突然袭击。杨勇接到去上海开会的紧急通知，带着秘书匆匆去西郊机场，在京的中央委员都来了，包括朱德。机场上停着两架专机，一架大，一架小。专机顶着小雪起飞了，到上海时，上海正下小雨，这小雨小雪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一出机场就拉到锦江饭店，还没喘口气，马上开会。总政某副主任的夫人召集陪首长来的秘书也开了一个会，说这次会议的文件不需要你们发，由总理秘书周家鼎负责会议文件，你们也不要过问会议上的事。平时忙得四脚朝天的秘书们乐得轻闲，什么也不管，也不问，坐车上街转。

听到罗瑞卿反党，杨勇大吃一惊，那时他和罗瑞卿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心心相映，但怎么也看不出罗瑞卿反党，反而处处觉得罗瑞卿是忠心耿耿。所以，像1959年庐山会议一样，杨勇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在当时就非同小可，人家都在旗帜鲜明，只有你一言不发，后果是很能想得到的。1959年的庐山，杨勇既没有提过激口号，又没有对反彭德怀加以评论。虽然平安无事，但这件事是记着账的，要不后来怎么会成彭黄漏网分子？上海会议又不表态，一而再，再而三，杨勇知道自己已经危如累卵。但他仍然不能去无中生有地伤害同志，宁肯自己也遭被打倒的厄运。就是被打倒后，杨勇还是坚持不批刘不批彭。他被押到裴堡农场，屁股还没坐稳，连队就召开了批刘大会，让杨勇表态。杨勇说这个人有错误，十几年脱离体力劳动，这次来连队劳动锻炼，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多帮助。一句也没批判刘少奇。以后又让杨勇写批判彭德怀的文章，他说什么都可以批，但彭总不能批，批彭总是不公正的。拖着，催急了就抄一遍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交上去。连长是大比武时的尖子，暗中帮他应付过去了。

乌云越垂越低，接下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再接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甚至廖汉生也被抓了，平静的北京军区也不平静了，杨勇感觉到自己在劫难逃。

果然一个星期后，厄运来了。

1月19日早上，杨勇还是哪也不去，连饭堂也不去，让小孙下去打饭。

快到中午12点半，来了个电话。

刺耳的铃声把小孙吓了一跳，是陈伯达打来的，说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到中国了，让萧华去迎接，4点以前要找到萧华。



这明明是给杨勇出难题。

杨勇说怎么办？

小孙说，是不是问问傅崇碧？

好，你马上通知傅崇碧，限他半小时找到萧华。

那时，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能办到这件事，一问卫戍区，就能问到萧华的下落。果然，找到萧华，说他在叶帅家，杨勇这才放心。

杨勇思前想后，想了很久，仿佛明白了一些什么。

◇ 雷一样的砸门声

廖汉生被抓走的那天中午，杨勇破天荒回到家中，把炊事员、公务员等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开了个会。杨勇家的工作人员就跟家里的孩子一样，他们听说政委廖汉生被抓了，都惶惶不安，首长如果出事了，他们怎么办？首长的安危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安危。杨勇说，廖政委是廖政委的问题，我没有事。我不反对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

工作人员心里有了底。

到晚上9点，杨勇对小孙说，把庐山会议上我的发言烧掉。他知道他没有批判彭德怀可能是一条很大的罪状。

一捆崭新的钓鱼竿也烧掉了。

以后，有人揭发小孙烧了几箱黑材料。

林彬也感觉到了大事不好，怕人家再给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她把那些出国带回的字画以及历年来的照片都抱到锅炉房，烧了一锅炉。同时她把家里的孩子集中起来，原来北北和京京住在最后边的房子里，都把她们集中到大客厅。大客厅里空荡荡地放了三张床，一个角放一张。

从1月19日开始，军区的大字报开始多了。到了20日下午，小孙发现实在紧张，威胁特别大，他就上京西宾馆买了四条烟，还从家里把杨勇的换洗衣服拿来。

他对林彬说了自己的感觉。

林彬也有不详的预兆。

在此之前，家里早已紧张到极点，明摆着，“叛徒”、“特务”、“走资派”，一个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一夜之间成了敌人，会不会有一天轮到杨勇呢？越来越大的恐怖笼罩在那些天里。只要杨勇在家，尽管他越来越沉默，林彬和孩子们的脸上还是有了笑容，工作人员脸上也有了笑容。

尽管那笑容是很勉强的。

那些天，文工团战斗队的马头头老找小孙，粘着不放。找到小孙，就找到了杨勇。一天上午，文工团在主楼围住杨勇和小孙，要求在主楼贴大字报，杨勇没有同意

中午，杨勇说不能上主楼，得走人，上85楼招待所。

小孙问，吃什么？  
简单点。  
多简单？  
清汤面条。

下午造反派又围住杨勇，一直折腾到晚上6点才散去。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杨勇问小孙，有事吗？  
到卫戍区开副参谋长以上干部会。  
有通知吗？  
秘书通知的……

早晨，杨勇从餐厅出来，准备去开会了，不知他心中是否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总之，他与平时不一样，特别想见一见孩子们。而这一天早上，还太早，孩子们都在睡觉，只有侄女沙瑞平过来了，正要进餐厅。

杨勇突然问，就你一个人起来了？  
瑞平和京京住一个房间。  
杨勇又问了一句，京京呢？  
瑞平说，还没起呢。  
那你们就好好呆着吧。

要是往常，杨勇就走了，而这次说完话，他还不走，一直用他那大大的眼睛盯着侄女。瑞平根本没想到这是伯伯被抓前的最后一面，她想走又不敢，就这样静静站了好长时间。其实杨勇这时也并不知道厄运在即，但他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什么，直到警卫员小孙催，首长该走了。

他才慢慢走了出去。

自从杨勇走出大门，就再也没进来。

杨勇虽然没回来，但几个白天总算平静地过去了，就到了让林彬坐卧不安的那天晚上。那天一听说杨勇去京西宾馆开会，小儿女们都吓了一跳，该不是抓爸爸的会吧？这个念头在孩子们心中跳动，却谁也不说出口。不会的，爸爸会像往常一样平安回来的。时间滴滴答答过去，都好晚好晚了，以前杨勇晚上开会，家人谁也没觉得什么。但这一次不同，有了异常。

林彬明明知道总机不会给接，还是要通了京西宾馆。

果然总机不给接。

按说这没什么，每次京西宾馆开重要会议，都不让接电话。

她叹了一口气，放下沉重的电话。

半夜，雷一样砸门声响起，还没搞清怎么回事，门就被撞开了。一群人和门外那狼一样呼啸的狂风一起冲了进来。

京京和瑞平都被从床上惊起来，抄家的果然来了，她们首先想到的是几个古代小瓷人。那时还小，以为抄家就是抄四旧，小瓷人应该算四旧吧？

哪里想到转眼工夫，整个屋子已经不叫屋子，像龙卷风刚刚过去，床上的褥子一层一层都被抖了个遍，衣服和书满地都是，办公桌的抽斗东一个西一个扣在地上，保险柜的门也大开着。压在玻璃板下的那张大比武时杨勇、杨得志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上，杨勇的脸上被打叉。就在那个时候，是被打倒的标志。

林彬的心掉进了冰窖。

一群人围着她大叫，文件呢？杨勇把文件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快交出来！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

在那群大喊大叫的人中，有一些熟面孔。这些熟面孔，以前常常到家里来，那时是笑容如水流得满地都是的。

林彬大声质问，你们有什么权力抄我们家？

杨勇是“三反分子”，已经被揪出来示众，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

抄家的人龙卷风般地走了。

天上的星星一颗颗消失了，天渐渐亮了，太阳受伤一般慢慢爬上来。

快中午时，跟杨勇一起去开会的警卫员孙启增回来了。

只有他一个人。

林彬听说小孙回来了，急忙出来，问首长呢？

小孙眼泪涌出来，说在卫戍区开会。

林彬不相信，那你怎么回来啦？

不让我去了……小孙望着到处被抄得乱七八糟的家，连自己屋也被抄了，实在忍不住，哽咽着说，林处长，我……我没有保护好首长，首长叫人抓走了……

话没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

孩子们听说爸爸被抓，全都傻了。

林彬吩咐老三北北给小孙倒了杯水，让他坐下慢慢说。

◇ 谁敢上来我就开枪

原来，一大帮人来抄家时，杨勇也在遭受劫难。

凌晨，几辆卡车开到京西宾馆楼下，车上跳下吵吵嚷嚷的一群人。杨勇的警卫员小孙自从廖政委出事后，睡觉老是睁着一只眼，他知道到非常的时期了。刺耳的刹车声把他惊醒，他悄悄打开窗户，正好听到一句。

杨勇住在里面，你们赶快上去。

小孙一看大事不好，忙叫醒杨勇，护送他直接坐电梯到地下室，从后门出去乘车驶上了长安街。

后面的车一直没甩掉，司机把车开进中南海。杨勇的车可以进中南海，后面跟着的车被挡在中南海门外。

于是，甩掉了尾巴。

小孙想，这时上哪呢？回家肯定是不安全的，军区办公楼更不能去，那都是自投罗网。去海军大院，找谁呢？在这种时候找谁都不行，还是上卫戍区吧。

小孙属于卫戍区管。

杨勇同意去卫戍区。

为什么同意去卫戍区？因为杨勇根本不知道是造反派还是上边要抓他。如果是造反派，那么卫戍区就可以躲一躲。如果要知道是上边的意思，不要说卫戍区，跑到天边也不行。

车子在街上跑了将近两小时，去了卫戍区。

打了一辈子仗的杨勇面对临近的灾难，束手无策。小孙给了他一点零钱，平时家里的账都是小孙管，杨勇身上没有一分钱。

这时，杨勇又一次说，我不是“三反分子”。

小孙说，首长，我相信。

抓杨勇的人在京西宾馆扑了个空，在中南海门口又被挡住。但他们知道杨勇上不了天入不了地，最终还是把杨勇堵到卫戍区的小礼堂里。

小孙举着顶上子弹的枪，横在门口，嘶哑着嗓子说，杨勇现在还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职务是中央军委任命的，我没有接到通知撤他的职，我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安全。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交人。如果有人硬抢，我就开枪。你们谁不怕死，就来抓人吧！

闹闹嚷嚷的人群目瞪口呆，站住不敢动了。

他们知道警卫员是特别训练出来的，说打眼睛不打鼻子。

有人马上给北京军区挂电话。

北京军区一位负责人在电话里对小孙说，杨勇有问题，这是领导的指示，你交人吧。小孙眼泪涌出来，他不动窝，枪还在手里举着，但枪口开始朝下了。

杨勇轻轻推开小孙，从容走了出来。

小孙把买好的烟交给他，周围的人吓得一退老远。

事后有人说小孙给了杨勇一支枪。

那群人马上要把杨勇带走，食堂炊事员端着一碗鸡蛋面拦住了去路，说杨司令吃了早饭再走。杨勇点点头，吃完飘着油花的那碗面，站起来平静地和炊事员握手，什么也没说，跟那群人走了。

小孙看太阳老高了，怕家里担心，赶快跑回来报个信。他站起来，激动地对林彬说，我给首长当了四年警卫员了，我不信首长会反党、反毛主席……林处长，你应该去找李先念。

林彬说，小孙，你了解我，也了解首长，我们不是“三反分子”。

小孙说，林处长，你们不要难过，我马上回军区打听首长的情况，一有消息，我就来。

小孙整整衣服，给林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走了。

林彬也忘记让小孙吃了中饭再走。

那一顿饭，林彬和孩子们谁也没吃。

小孙追到军区大院时，高音喇叭狂叫，那群人正在游斗杨勇，给杨勇戴上纸篓做的高帽，伸出来的铁丝尖把杨勇的头划破了。他们按下杨勇的头，让他认罪，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杨勇使劲把头抬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如果我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

某人硬按下杨勇的头，使他的下巴重重地磕在话筒上。

鲜血缓缓地流下来。

有一次三军参加的在北京军区露天舞台批斗彭德怀，拉杨勇和罗瑞卿、萧华、李志民、苏振华、刘震、吴克华等10位将军陪斗，每个人都被两个大汉扭成喷气式，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打着红叉的大牌子。被批斗的人中有一个摔倒在地，又被强拉起来。一位当年大院的小孩回忆，那天，会场上坐得满满的，人很多，他们小孩就到处钻，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大筐里的罗瑞卿。

另一位大院职工回忆，怎么叫杨勇低头，杨勇就是不低头。

那时，三天两头挨斗。每次挨斗，杨勇都是这态度，让他低头，就是不低。造反派找了几个大个的篮球运动员来按他的头，也还是不低头。以后，在北京的军队大院里转着斗。每次斗，杨勇都是如此，不但不低头，还用眼睛四处看。他坚决不承认什么“三反”，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在军区小礼堂斗他，他大声质问，谁说我是“三反分子”？谁说我是“三反分子”？有什么证据？

给杨勇安的罪名很多，其中一条是廖汉生揪出来，军区党委为什么行动迟缓？

杨勇说，我是书记，有什么事我负责。上面有军委，我要向军委报告，不是一下解决的……

有人粗暴地打断，不让杨勇再说下去，又问某次会议怎么怎么……

杨勇说，某次会议谁谁谁在，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他当场问副司令员、副参谋长，是不是这样？

有人说，你反对一、三军团合并。

杨勇说，我不是反对一、三军团合并，我是对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有不同看法。

有人说，你搞兵变。

杨勇说，我一个人能搞兵变吗？北京军区哪个军是我杨勇的？

确实，在首都动用部队有严格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动用一個营，可以由军区批准。而在特殊情况下，不用多，一个班，也要经过军委。有一次，政委廖汉生在军区调一个班搞英模活动，还追查半天。

……

造反派哑口无言。

批斗会常常是这样，开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

1982年夏天，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张振川和爱人汤小微听说杨勇动了大手术，来看望他。那天，杨勇谈锋颇健，他站起来笑着说，我给你们看看我挨斗的照片。

相册放在最高处，杨勇站在椅子上，还踮着脚，才从书架上拿下一本相册。

他一张一张翻给他们看。

这是我挂“三反分子”牌子照的，看，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了大叉。

张振川看见，照片上还有些标语，彭德怀反党集团漏网分子，为反革命分子彭真效劳……他心里真不是滋味，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名将呢？

杨勇却谈笑风生，毫不在意。

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杨勇都坚信自己是无罪的。

◇ 老天有眼，首长他冤枉啊

杨勇被抓前，家里已经很紧张了，老二冀平在学校不怎么回家，他几乎和父亲杨勇同时被抓，家中的男子汉只有老三北北。藏书大都烧了，北北走前，挑出一些书扔到房顶上，这使他以后的日子有了书读。事先已经来了几个人，把家中的箱子柜子贴上了封条。林彬怕有人抄家，北北闹起来，把老三北北放在她同事家中。所以，抄家那天，北北不在。

老大杨小平从哈尔滨回来了，一看家被抄得不成样子，心里真不是滋味。

林彬说，你赶快走吧，别再牵连你。

杨冀平被无故关了10多天，母亲林彬坐公共汽车去接他，他马上敏感到家里出问题了。他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到街上的西安饭馆，吃了一顿饭，林彬讲了家里的大致情况。

当天下午，家里的工作人员除了小孙和老王全都被勒令走了。小孙是因为成了和杨勇一样性质的问题被强留下来的，炊事员老王是他自己决定不走。

老王叫王文彬，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老炊事员，天津人，在朝鲜就给杨勇做饭，1958年随杨勇回国后，就一直给杨勇当炊事员。他比杨勇大一岁，杨勇很尊重他，叫他大哥。闲时他常常找老王聊天，无拘无束，像是亲兄弟。有一次，老王发高烧，杨勇亲自打电话叫来医生，自己在一边守着，直到老王退烧后才去睡觉。

这么多年，老王和杨勇的感情很深。

以后杨勇说，老王是我的钢杆保皇派。

院子里很快贴出了勒令大厨师三天撤出的大字报，说如果不走，就不不再开工资。老王说，我一个工人，我不管，不发工资就不发工资。

但是，不发工资怎么办？老王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呢，只好走了。走之前，老王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做饭。临走，老王说首长他冤枉啊！老天有眼，共产党英明，像首长这样的好人不会老受屈，等他出来，我还要来给他做饭。

这话真让老王说着了，以后老王果然跟到新疆军区继续给杨勇做饭。

杨勇被抓后，小孙的枪被收掉了，每天小孙走到哪都有人跟着，他被扣了很多帽子，说每年都要换警卫员，为什么你四五年不换？让他讲“二月兵变”。明明是无中生有，却非要搞成真的。说1966年杨勇到天津读书班读四本哲学著作，实际是搞“二月兵变”，想推翻中央。李雪峰也在，还见到周扬，逼着小孙写东西。

小孙说，杨勇绝对不反文化大革命，隔壁的民主建国会住着好多串连的红卫兵，杨勇说一定要让他们吃好喝好，不能闹病。

造反派说，杨勇和罗瑞卿的关系不正常。

小孙说，不，正常，他们接触我都知道。我到罗总长家里去，都是传递文件，和贺龙也是正常工作来往。

杨勇生活腐化。

更没有了，杨勇基本不去跳舞，偶尔去一次，都是点个卯就走……

可以说，专案组拿杨勇没办法，拿小孙也没办法，警卫员都是挑了又挑，查了三代，由组织上派的。审了好长时间，审不出小孙的问题。到了8月，小孙被戴上“三反分子爪牙”的帽子劳动改造去了，到农场打稻子，又到黄寺化肥厂推化肥，一推两三个月。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黄寺化肥厂变成了华戎招待所，小孙成了老孙，在那里当主任。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小孙仍和杨勇的孩子们有来往。杨勇的孩子和小孙特别好，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商量，不敢在家里见面，就偷偷打电话，约在新街口街上，一直到小孙被处理回家。

杨勇调到总参，第一个给小孙打电话，说给你平反回北京，家属也调来。还说不叫谁回来，也要叫小孙回来。小孙来到北京，杨勇请他一家吃饭，说小孙是个好同志，受我牵连，沾了我的“光”，现在好了。

小孙家属第一次见杨勇，说没想到你跟首长这么熟。

现在每年小孙都要去看林彬，俨然成了她的一个儿子。

杨勇平时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又很注意小事，平时孩子上学都是小孙骑车接送，杨勇从不让家人动用小汽车。军区供应的主副食品，杨勇都要问一声给钱了没有。他说，不能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人家给我提好多意见。有一次下部队，部队给了一麻袋花生。小孙说付钱了，杨勇非要看发票，还问吃饭给了钱吗？

那么罪名怎么成立呢？从别的专案组转来一些揭发材料，说杨勇和廖汉生搞阴谋。查来查去，都是大帽子，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有一天，专案组震惊了，查到杨勇是叛徒。以为抱了个大金娃娃。再一查，杨勇根本就没离开过军队，更没被捕过。搞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是同名同姓另外的人。

搞来搞去，老是立不起案来。

杨勇十三四岁就参加了农民运动，以后一直在军队中，出生入死打了大半辈子仗，直到1958年才从朝鲜回国。回国后，在北京军区又一直忙着战备和生产。

想在鸡蛋里挑骨头，挑不出来嘛。

◇ 重磅炮弹没炸出来

杨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却成了“三反分子”。

最初关押时，他曾给毛泽东和叶剑英写过信，说自己被关押起来了，意思是北京军区他已经不能负责了。

他觉得党中央毛主席是了解他的。

其实，抓杨勇，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有个电报，说什么什么时候，群众已经把杨勇同



志抓起来了。因为有称同志一说，批斗会上还争论起来，说党委都称同志，为什么不让我们称同志？

最终，杨勇的问题没有升级，没有被关进监狱，主要是因为杨勇确实没有任何问题，专案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搞不出什么材料。别人的专案材料厚厚一本，而杨勇搞来搞去，才一张纸。当然也应该归功于杨勇身边的工作人员，杨勇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人揭发。警卫员孙启增宁肯被关押，也不胡说一句。早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司机李英华，也没有被专案组忘掉。两个军代表找到他，问杨勇找过彭真没有。李英华说找过。去过几次？就一次。上他家去了？李英华说，胡说八道，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往左拐，一进门，就那儿。他跟彭真说话了？这不废话吗？李英华火了，我告诉你，我知道都不告诉你！说着就要走，军代表忙说，李师傅，你别走，你给写一下。李英华不写，好，我告诉你，他去了彭真家，呆两分钟就出来了，彭真不在家！

秘书王韶华，摄影记者杜心，也是宁肯自己遭到迫害，也不作伪证。以后专案组讲，杜心是一发重磅炮弹，幸亏杜心没讲什么东西。否则，杨勇会罪加一等。

上海会议后的一天，《解放军画报》的摄影记者杜心来看杨勇，杨勇把他让到院子最后面的作战办公室。这是杨勇在家办公的地方，平时除了秘书从来不让别人进。里面挂满了作战地图，还有一排电话。杨勇说，小杜，开始整罗大将了，我认为罗大将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我正大光明，他们要我交代大比武，大比武是毛主席叫搞的，你在现场，你知道，军队不训练那是土匪，严格训练才是部队。

杜心一贯在杨勇说话时不加以评论，只是静静地听，但杨勇知道杜心是赞同他的话的。杨勇被抓不到一个月，北京军区专案组来了三个人到《解放军画报》找杜心，带来一张杨勇亲笔写的条子。

小杜，我的情况你已知道，你实事求是如实地向他们反映我的情况。下面是杨勇的签名和日期。

“实事求是”，还加上“如实”？

以后杨勇对杜心说“如实”是他特意加上的。

杜心看完条子，问杨勇关在什么地方？

专案组说，不能告诉你，你没有权力知道。

杜心问，他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他搞大比武，他是得力干将，让部队走歪路。

杜心说，我知道，大比武是毛主席批准的，你们不是也执行了吗？

不要辩论，最凶的专案组成员粗暴地制止。

杜心说，这是事实。我当时在现场拍摄大比武，我亲耳听见毛主席对杨勇说，你的部队很好，练了一手过硬的本领，我看了很满意。毛主席还带头站起来鼓掌，叫杨勇把新式步枪拿来给他看。你也去调查调查，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专案组问，我们不在现场，用你记者的眼光看，杨勇是不是把部队带上歪路，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不跟毛主席跟罗瑞卿，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杜心当过多年记者，知道笔录的厉害，光有答话没有问话，你不知道他会用在什么地方。杜心说把你的问话先写上，否则我不回答。这一着聪明，你想往笔录里胡加，加不上。

专案组不写，杜心说，你不写我也不说。直到专案组把他们的问话写上，杜心才说，以我多年观察的眼光看，杨勇一贯对部队训练严格，过去有句话，叫严师出高徒，只有严格训练，才能培养千百个将军。

专案组大叫，你这人反动。

杜心说，你来吧，你贴大字报，不要这样叫。

谈不下去，专案组只好转到第二个问题，拿出杜心在朝鲜拍的照片，让杜心回答在什么地方拍的，然后说杨勇出卖国家土地和机密给朝鲜，是朝鲜修正主义分子。

杜心等他把问话记上，回答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在朝鲜，参加了志愿军总部的所有会议，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李志民，可以到军博查。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去坐牢。

你敢这样保证，他在朝鲜没有秘密活动？

杜心说，杨勇夫人有交代，他有肺气肿，警卫员不懂，让我跟着他。杨勇走到哪我跟到哪，寸步不离，我保证他没有非法活动。

来人不信，杜心说，既然你们认为我没资格回答，就不要找我谈了。

好，这个问题过去。第三个问题，你跟杨勇多年，他有没有反毛主席的语言和行动？

杜心想也没想坚决地说，没有。

怎么没有？

你们说有，你们自己写上，我接触就没有。

杜心讲了杨勇和崔庸健在毛岸英墓前祭酒的故事，其中两个专案组的人都流下了眼泪。那个最凶的专案组没哭，还铁石心肠说杜心是保皇派。

杜心说，你的行动将来历史会作结论。

专案组作好记录，让杜心看完了签字。后来专案组对杨勇说，杜心厉害，他那个重磅炮弹没炸出来。杨勇叹口气说，小杜要吃亏了。

杨勇从三〇一医院治好腿出来，住在白广路，他让儿子杨小平打电话叫杜心来。杜心从哈尔滨赶到北京，林彬见了他不说话，抱头大哭。好不容易止住哭，说杨司令去看病了，马上回来。杨勇见到杜心，握着手不放，说小杜，我马上要到京西宾馆开会，咱们在车上谈。杜心心里一亮，你出来工作啦？杨勇说，我不是去看病，邓小平找我谈，让我和罗瑞卿负责军队。现在来说说你，专案组把你的证词给我看了。杜心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杨勇笑了，你真是如实反映，其实你应该保留一点。杜心说，你不是让如实说吗？杨勇说，这样你吃苦头了吧？还在画报社吗？杜心说，不，我调到沈阳军区某团去了。杨勇眼圈红了，说张三吃了什么苦，李四吃了什么苦，跟我的人几乎都吃了苦头。

送专案组出门时，杜心悄悄问流泪最多的那个专案组成员，杨勇关在什么地方？那人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八大处。

杜心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心听到的。

杨勇被抄家后，杜心曾去过他家，两个大封条封在门上，门口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杜心掏出记者证，说我能不能进去？卫兵说不行。杜心只好走了，这以后，他一直想找到杨勇被关的地方，看看他。有了准信，他借口到高等军事学院采访，要了个吉普车就上山找开了，杜心还特意带上杨勇爱吃的蜜桔和中华牌香烟。山上的房子不多，很快就找到了一座两层小楼，楼外有卫兵，让他远离，不要靠近。杜心掏出记者证。他有两张记者证，一张中央级的，一张军队的。卫兵说，你找他干什么？杜心说有点小事。有介绍信没有？没有。他已经走了，到连队当炊事员去了。卫兵说如果不走，你要看他，一定要军委的介绍信才行。因为杨勇已经走了，卫兵让杜心趴在窗户上看了看。杨勇大概是才走不久，白床单，枕头，一套薄薄的铺盖还在那，叠得整整齐齐，原封没动。

杜心看着看着，眼泪流了下来。

#### ◇ 患难之中见真情

1967年头几个月，杨勇还被关在北京军区大院。领章帽徽被扒掉了，每天穿一身旧的绿军装，但他的身板依旧挺得笔直。军装穿在他身上，再合身不过，就像为他定做的一样，他依然是军人。

一天，杨勇到军人服务社买牙膏，后面跟着看守的士兵。那时，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他看见杨勇买了一把鞋刷子。晨耕注意到杨勇没穿皮鞋，他一定是买刷布鞋的刷子，却买了一把刷皮鞋的刷子。售货员什么也不说，你要什么我就拿什么。

晨耕没管那么多，上去打招呼，司令员……

杨勇马上说，什么司令员，我不是司令员……

杨勇同志……晨耕换了个叫法。

同志也不是了。杨勇望了一眼和自己一样被扒掉领章帽徽的晨耕，尽管他们过去很熟，常常玩笑来玩笑去，但这种非常时候，他不想连累别人。

晨耕是文工团最先被打倒的头号“走资派”，每天监督劳动，只不过没那么严，晚上还允许回家睡觉。他想，反正我已经是“死猪”了，再开水烫也是死猪。晨耕坚持说，杨勇同志，你买的刷子是刷皮鞋的，不能刷布鞋。

杨勇感激地点点头。

一年四季，杨勇总爱穿布鞋，在外事场合，杨勇穿皮鞋。一次，西欧一位国家的三军参谋长临走前，看杨勇的皮鞋式样真漂亮，问他是什么地方生产的。

杨勇笑着，说是中国北京皮鞋厂。

其实，他的脚早被皮鞋挤得不舒服了，回到家，马上换上布鞋。所以他的这双三接头的皮鞋，能穿35年，脚后跟钉了个掌，还在穿。布底布面的黑布鞋，更因年代太长破得不成样了。杨勇准备去朝鲜访问时，孙子南南曾问，爷爷，你就穿这双鞋走，人家拦着不让你走怎么办？

杨勇说，这双鞋怎么啦？不是挺好的嘛。

确实杨勇的鞋不错，是盛锡福鞋店做的，名牌，手纳的千层底，礼服呢的面。可穿的时间太长了，底破了，面也破了，白衬里露了出来。杨勇让夫人林彬补一补，林彬拿出一双新鞋，

让他换上，说你那双鞋，连打掌钱都不值。杨勇舍不得扔掉这双鞋，找司机借了点钱，上街去打了掌。并用墨水把露出白布的地方抹了抹。仍然是上班不离脚。

有一段时间，杨勇被关在北京军区大院72楼，只要他出来，总有很多干部战士、职工在向他行注目礼。有一天，烧锅炉的王木匠看见杨勇，热情地叫他首长。杨勇说别叫首长。

王木匠心想，我怕什么，这么好的首长，就是首长，执意要叫。

杨勇示意身后有人跟着。

王木匠心想，我一个木匠能打倒到哪里去，连说没关系。

那时，杨勇在政治部食堂吃饭，虽然有人监管，还是有好心的干部悄悄给杨勇端来油条。

因为这样的事情多了，又总不能不叫杨勇出来放风，专案组就把他转到山上的小楼里关起来，不让他和群众接触。后来转移过好多个地方，远在山里的工程兵大院的后仓库也曾关过。以后，杨冀平到工程兵部任副部长，还专门去看过那堵高墙。

但是，仍不能隔断战士和杨勇之间的同志之情。

看管杨勇的战士为杨勇买来挂面鸡蛋，说司令员，您要保重身体，国家、军队需要您。有的干部说，司令员，您身体怎么样？您要珍重啊！

看管的官兵不得不换一批又换一批。

又频频转移。

最后把杨勇转到邯郸裴堡农场。

杨勇在三〇一治腿出院后，曾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住过一段。那时，不少还没有解放的老同志都住在这里，没事大家就一起聊天。

杨勇很乐观，话也比过去多了，他说过这样一段过程。

那是说起文革中有些身边工作人员揭发，大多是无中生有，议论靠住靠不住时，杨勇说，我当时换过好几个名字，搬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怕我和战士熟了。其中叫过老杨，连名字也没有，临时住院时专案组给起了个名字王长树。杨勇说，到连队也没别的事，部队拉练去了，我们留守的人在一起打球，找个吹哨的，战士说就叫老杨吹哨，我就当了裁判。为了躲球，被场边上的枪绊倒了，股骨胫骨折。

当天晚上送到师医院。医护人员报告送来一个解放军老同志，院长马上来查房。

邯郸地区是当年的冀鲁豫战场，杨勇在这一带活动很多，几乎家喻户晓。师医院的院长是抗战时期的卫生员，一眼就认出了杨勇。半夜院长又来了，说首长，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杨勇马上否认，我不是杨勇。

院长说，我是当年你手下的卫生员，给你护理过伤。

杨勇还是不承认。

在那种时候，不知院长是好人坏人。

院长说，首长，你右边脸上这一个坑，是子弹打的。

脸上的伤疤谁都能看见，杨勇没吭声。

院长又说，你身上还有三块伤疤，在山东交界的什么地方，是抗战后期炮弹炸的。接着，院长讲了杨勇负伤的地点，说他当时是卫生员，给杨勇包扎过伤口。院长说你有什么事尽管交给我办。

在文革那种时候，人际关系复杂，杨勇虽然相信了这位就是当年的卫生员，但还是不敢说更多的什么，就说，你要想帮忙，就替我送一封信。我写几个字，你找我爱人林彬。这以后杨勇被转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被派来护理杨勇的战士小姚又给林彬拍了电报，林彬很快带着女儿京京从宁夏赶来。费尽周折，把请求让杨勇到北京手术的信递到了周总理手里。在总理关心下，杨勇坐专机由石家庄转到三〇一医院，成功地动了手术，保住了腿。

杨勇刚开始到农场的连队时，被打入另册。和战士们一起下地劳动，种稻子挖水渠，都是很重的体力活。对于一个近60岁的老人来说，是相当吃力的，而专案组却不让他吃战士伙食，只许他吃二等的犯人伙食。吃了几天，连队自作主张，让杨勇和官兵们一起吃，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照顾他，多给他打一点好菜。但杨勇很自觉，和战士一样排队打饭。

大约是1970年4月，军区保卫部来人宣布恢复杨勇的军籍。重新戴上领章帽徽的老杨“待遇”照旧，但他的心情总算有了一些晴朗。白天看不大出来，到了夜里，隔壁的战士常常听见杨勇在梦中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战士们说，不管老杨是白帮黑帮，反正他能打仗，咱们国家咱们军队肯定还会用他。大家商量着暗地保护老杨。

很多年以后，杨勇仍记得战士帮他捞手表的事情。

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进军西藏前，看见杨勇戴的表好，就要换。其实他的表也不错，很老的劳力士，就是旧点。杨勇好说话，换就换了。以后杨勇一直戴着这块表。在裴堡农场劳动时，有一天洗手，表不小心掉到水渠里去了。

他本来想就算了。

班长命令全班战士下去捞。年轻人手脚麻利，很快捞上来。

于是，这块表成了杨勇的宝贝。

忘年的友谊就这样越来越深。

杨勇因大腿骨折住院后，就离开了连队，战士们都很想念他。

杨勇也很想念裴堡农场的纯朴可爱的战士们。

1973年2月，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从沈阳给裴堡农场的卫生员小吴来信说……别来已经两年，我们在连队相处虽只一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近60岁的老兵和年轻战友在一起劳动，给我的教育很大。……你们很快就要复员回苏州老家，也好，在军队锻炼几年，回到社会上去，一定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更多的事。我现在很好，沈阳军区有很多老战友一起工作，形势很好。连队如何？老同志还多吗？……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如果我有机会进关到河北邯郸地区一定到一连拜访……

杨勇生前一直想再去一连看看。在他生命垂危时，他还在想念患难之中对他真诚相待的干部战士。

（未完待续）

□ 摘自 舒云《百战将星杨勇》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